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凤鸣

目录

- 第一章 获罪
- 第二章 初到农场
- 第三章 景超的来信
- 第四章 我们的演出活动及其他
- 第五章 “瓜州”的瓜熟了
- 第六章 狂热的安西
- 第七章 疏勒公社的出现
- 第八章 红火的演出与演出的夭折
- 第九章 我和小徐当了四大队的中队统计
- 第十章 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 第十一章 1959 年岁末的变迁
- 第十二章 饥肠辘辘
- 第十三章 改造又升了级
- 第十四章 第三次夏收时节
- 第十五章 我的亲人迁场到了高台明水
- 第十六章 口粮一减再减
- 第十七章 11 月 1 日终于来临
- 第十八章 派我去“医院”烧炕
- 第十九章 在最严峻的时刻（一）
- 第二十章 在最严峻的时刻（二）
- 第二十一章 地狱之行
- 第二十三章 回到兰州
- 第二十四章 三十年后的祭奠
- 第二十五章 幸存者中的烈士
- 第二十六章 一次奇遇·尾声

开头的話

在千年之禧到来的今天，新的时代向我们展示了光明灿烂的前景！已经过去的 50 个年轮中，我们有过意气风发、欢欣鼓舞的建设年代，也有过风萧雨晦的苦难岁月。

在共和国 50 华诞大庆之际，我心潮激荡。1949 年，我 17 岁。我放弃了已考上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以满腔的热情投身革命，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半个世纪来，伟大祖国经历的一切变革，我都是参与者。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欢欣鼓舞。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风风雨雨，我也亲历其中，并经受了巨大的不幸和痛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全国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国家繁荣强大。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也深受其惠，我个人的一切整个翻了个个儿。我感到幸福，也感到无比自豪。

我深知，现在的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以 17 岁的年纪投身革命，刻苦努力地工作，在甘肃日报社当编辑、记者，也曾经历过很艰难的几年。初到报社时，编辑部工作人员只有几十人，担子重，每天除白天紧张工作 8 小时，晚上还很正规地上班 2 小时，后来，星期日上午也要上班 2 小时才能休息。当时，我还是个 17 岁的女孩啊，上中学时，每上完一节课，就可以自由活动，在校园里玩一会儿。初进报社，我是个见习编辑，每天主要是处理通讯员的来稿，一屁股坐下去，不论上下午都是 4 个小时，一动不动地伏案工作；一开始我觉得很不习惯。当时实行供给制，我身穿发的灰布制服，脚登群众手做的军鞋，因为鞋大脚小，用一双鞋带穿过鞋帮，系住了鞋带才能走路。我对这身装束很感自豪，因为只有革命者才会有这种打扮。在工作上，我当然更是以一个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要好好地锻炼自己，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很快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战士。不习惯于一动不动地伏案工作，我怎能很快成长为一名新闻战士？所以，我强制自己很快习惯于上下午以至晚上都很自然地伏案工作，而毫无怨尤。

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认为在甘肃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正是我为人民服务的最佳途径。我热爱新闻工作，觉得从事新

闻工作，也是我人生的最佳选择。

后来，我成了家，做了年轻的妈妈，肩起工作和生活的两副重担，则更是艰辛。工作还是每天 10 小时，哺育孩子，使我长期睡眠不足，我会在学习、开会时睡去……给孩子哺乳期间，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尚艰苦，我因无法补足营养而消瘦异常。到小儿子刚满 1 岁，我立即给他断奶，然后申请外出下乡采访。50 年代的农村，各方面的条件很艰苦，在广阔的天地里，我由于在生活的源头获得了采访的自由而感到其乐无穷。

我的丈夫王景超从小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过奋力拼搏，在解放前两三年考入了西北大学上学，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作为由社会的底层进入大学的大学生，他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西安解放，他就报名参加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经过一路艰苦的行军到了兰州，参加了《甘肃日报》的创办工作。他才华横溢，刚正不阿，时时处处听党的话，为办好党报出力出汗，写出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和通讯，成为当时编辑部令人瞩目的新闻战士。他在土改期间写的《二十串麻钱》为人称道，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的《修筑天兰路的钉道工人》，被选入《天兰铁路通车纪念画册》广为流传。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坚强战士。

经过 8 年新闻工作的实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底，我们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之奋斗终生。

但是，到 1957 年反右斗争期间，我和我的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们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 1960 的大饥馑中，王景超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我总算死里逃生，回到了甘肃日报社。1961 年 9 月，甘肃日报社领导宣布为我俩和其他 8 名难友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安排我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资料室工作。十年浩劫中，我又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我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前后达 11 年之久。在我的大半生里，我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更在 11 年里作为阶级敌人受尽各种凌辱委屈，我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到 1978~1979 年，我和王景超的右派问题终于改正。甘肃日报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 11 名右派分子全部获得改正。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不仅我们家遭受劫难，几十万知识分子在遭

受劫难，中国人民都在遭受劫难。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上，不分职业、文化、民族、阶层、年龄等等，不问其主观意向如何，都程度不同地忍饥挨饿，千百万的人因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回首往事，我的大半生历经坎坷辛酸艰难困苦，我踩着苦难前进，有过度日如年的忧伤悲凄。但是，苦难也重新铸造了我，在最艰难的境遇里，在饥饿已危及生命的日子，我一直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并确信，严寒总会过去，明媚的春天终将来临。我终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并不是什么右派，而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我没变，我还是原来的我。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我多年被诬为右派分子的岁月里，我的艰难困顿，我的人生遭际以及由之而带来的感情痛苦，在当今中国并不鲜见。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认为我对人民对历史，尚可作出我特殊的奉献，这就是用笔墨把我经历了的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把我经历了的苦难和奋争，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的苦难和奋争，以我独特的视角将它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写出我对人生的感悟，让苦难和奋争成为一笔精神财富警示后人，使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勿再重演。

季羨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说：“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我心里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引自季羨林《牛棚杂忆·自序》第 6 页。）

我认为，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建国以来沉重的历史教训而取得的。过去的错误，使我和我的难友们受苦受难流血流泪，有些人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我们的苦难融进了历史，又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党恢复了实事求是，大力纠正了错误；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从而使自身力量更加强大。展望我们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我充满信心，但我也仍有忧虑，我们长久以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农民意识普遍存在，封建主义的思想余毒仍无处不在，在短时期里难以清除。在未来的年代里，我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无奈的、沉重的历史，就一定不会重演吗？

我决定忠实地写出我这段无奈的经历，正是由于心中也“万分担忧

”，我绝不愿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沉重的历史，在“将来气候一旦适合”
，还会重演。我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沉重的历史，也是几十万知识分子经历了的悲剧。对这段沉重历史的描述与展现，我想，它对我们继续总结沉重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改革开放，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大踏步地前进，是会有好处的。

为此，我已花费了10年的辛苦。在这10年里，我敞开记忆的闸门，让40年前的苦难一次又一次呈现眼前，远距离地回顾过去的那一页，我那已凝滞了多年的感情仍禁不住地震颤不已，内心掀起雷霆风暴。但我坚决地挺住了，为了奉献，我得挺住。10年辛苦，10年拼搏！

纪实文学贵在真实，其艺术魅力来自真实。我自己经历了的一切，作为生活，其丰富生动的内涵是客观存在，我没有必要做任何的矫饰。但，这毕竟是发生在40年前的故事，所以，我仍在不断地勘误，力求书中事件的发展变化，情节与细节的出现，都符合实情。我是这样努力地做了，但一切是否尽如人意，尚待了解当时实际情况的读者指正。当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进行过一些采访活动，采访对象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我不敢保证他们介绍的事实不会出现记忆的失误。对此，我力求对证，争取勘误，但，也有难以查证的情况，还望得到读者的鉴谅。

第一章 获罪

1958年4月下旬，由兰州西去的一列火车上，乘坐着甘肃日报社新近被定为右派分子的6个人，他们原都是甘肃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其中一个年轻女性就是我了。我和我的丈夫王景超坐在一起，我们全都没有卧铺——确切地说，都已失去了享受卧铺的资格；火车长时间的颠簸，使每个人都十分疲惫。我紧紧地靠着他，斜倚在他的肩头上闭住了眼睛。在公众场所，我从未和他这样亲近过，现在，我还想跟他更亲近一些，因为我们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却将劳燕分飞。偶尔袭来的睡意总是瞬间就消退了，我哪能睡着呢。我们相聚的时间没有多少个小时了，到了酒泉，他就要下车，当时报社要他去劳动教养的地方是酒泉夹边沟农场。作为报社的头号大右派、极右分子，他已被开除公职，报社已与他一无干系。他将怎样走完他的人生之旅？我们将怎样从我们共同的苦难历程中拔步行进？此时，我们都没有想它，我们也很少说话，一切都在默默无言中。但我们是多么珍惜这最后相聚的20多个小时，如果我们知道这将是我们的生命历程中相聚的最后20多个小时，我们将会怎样充分

地使用这 20 多个小时的分分秒秒！啊，变幻莫测的人生，难以逆料的生离死别！

才刚过去的 1957 年夏天，风雨如晦，我们在未能逆料的政治风暴中遭了难，共同的罪名将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我为他蒙受的奇冤和屈辱痛苦得心都碎了，他由于我是受他牵连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悲叹不已，我们被打成了一个右派小集团，还被起了个不太美妙的名字——“黑社”，我被划入“黑社”，完全是由于我是他的妻子。

1957 年 5 月下旬到 6 月初，我曾随甘肃代表团到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全报社去了农村部的副主任曲鹤云和我两人。在那个年代能去北京很不容易，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所以能去，是因为那一时期我在工作上表现突出，我在甘肃农民报主持编二版，在农民报内部红旗竞赛中，二版屡得红旗，我个人也被评为先进，奖励了一支浪琴牌钢笔。甘肃农民报是甘肃日报社的一个部门，接受甘肃日报社编委会的统一领导。

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心情格外激动。让我欣喜的是，景超 1951 年在庆阳报道土改时认识的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杨允文，也出现在代表团内，我们已是老熟人了。我们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大旅社后，第二天随团参观，开始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大开眼界。两三天后，虽觉得每个展室都有新套套，但心里急着想到北京有名的景点去玩玩看看。北京还有我兰州女中的几个同学，一定要见见面。而参观的日程安排很紧，几乎没有多少闲空，这样，后来便不得不放弃有些参观自由活动了。和我同来的农村部副主任曲鹤云，是才从县上调来不久的党员干部，我们原来接触极少，不熟，要自由活动得有个伴儿，最佳选择便只能是杨允文了。杨允文也是首次来北京，和他在一起，他口口声声说我是他“好友的妻子”，我们拿着北京游览图找故宫、天坛、颐和园，他总能很快找到，并弄清应坐哪路的公共汽车就能到达。在颐和园，我们租了小船，荡舟在昆明湖上，是他自由挥动着木桨，我们在岸边杨柳依依、风景如画的昆明湖上流连了两三个小时。我要找同学，有的同学住在胡同里，北京胡同如蛛网般，进了胡同，我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但他分得清，并能耐心地询问，帮我一定找到。记得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刘昆的宿舍，就是经他帮助找到的。刘昆的爱人束沛德出差在外，我在她家住了一夜，畅叙别情。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还一起到北海公园走了走。找到了在中央气象局工作的党贻，当晚她还带我找了住在附近的于沪生。于沪生在北师大俄语系毕业后，分配在马恩列斯理论编译局工作。当时，北京正有大量的荔枝上市，每斤三毛五，

物美价廉，我平生第一次吃杨贵妃吃过的鲜荔枝，真是吃得惬意极了。党贻当时还没结婚，我和她在大宿舍同睡一床，第二天她上班，我自个儿回了西苑。

在北京，我们也和报社在京的二位同志见了面。第一位是副总编辑叶滨，当时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听说我们在西苑大旅社住，他特意赶来同我们见了见面。第二位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的杜修文，他是工农干部出身，陕北人，是我和曲鹤云去学校找的他。当时已是晚上，林希翎正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说，杜修文不屑地说及此，显然很反感。当时，我们尚不清楚林希翎何许人也，没有说什么看法。

在参观农业展览馆期间，各省的代表团还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一起照相。我们得到这一信息，非常激动，一直在急切地等候安排。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上午通知大家不要外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要接见。10时左右，大家坐车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前，草坪上早已摆好了呈半圆形阶梯式的长凳。甘肃代表团因为有少数民族，我们的团长就是回民，是民政厅副厅长马淳靖，照相时受到优待被安排站在最中间，女同志站前排。我的前面就坐着周恩来，左侧前方是毛泽东的座椅。此时的中央领导人大都五六十岁，他们的面色红润健康，显得都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十分和蔼可亲。当周恩来来到我面前将坐未坐之时，我真想伸出手去和他握手，因接见前已有叮嘱而作罢。领队曾告诉大家，如果毛主席、周总理同每个人都握一下手，他们的手会握疼的，最好不要主动和他们握手，我就听话地没有伸出手去握。

在我们来北京之前，5月1日，中共中央已在报上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闻风而动，连续配发社论，鼓动知识分子及各民主党派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我对这一运动，尚未在意，没放到心里去。及至到了北京，对整风这样的国家大事早已置诸脑后，报纸当然是不看的。到我们临离开北京时，《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发表，中共中央已公开发出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号召，我仍浑然不觉，根本没有意识到反右派跟自己会有啥关系。

从北京回来不久，报社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积极参与，对党的号召积极响应。此次领导上号召帮助党整风，我仍真诚地响应号召。此时，甘肃农民报的总编辑薛剑英、副总编辑流萤，我们原来相处都不错，工作上合作得比较协调。特别是流萤，他脾气好，我学画版样都是他手把手教的；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大家

都愿意向他讨教，同他商量。可是，1954年，宁夏同甘肃合省，从宁夏来了个女同志×××，也被放在了副总编辑的位置。此人资格比流萤老，贫农出身，也曾是大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她原来在宁夏一直搞妇联工作，不懂新闻，她的丈夫××，原为宁夏日报总编辑，来甘肃后，被任命为甘肃日报副总编辑。不知为什么，×××来甘肃后，愿意改行搞新闻，就安排到甘肃农民报当了副总编辑。我从1952年开始独立编版，已能独当一面。×××作为副总编辑，每期报纸的大样，她都要过目审阅。但是，作为新手，看大样时常常出错，通顺的句子，她会改得不通，有些政策问题的提法应十分确当，经她改动一两个字，就变得似是而非。我作为二版的负责人，对于由她审阅大样感到非常为难，对她改过的大样，我们如有不同意见，认为改错了或有不确当处，会与流萤改过的大样作出对比，向她提出：“流萤在这儿没改”或“流萤的看法”如何如何，我们原本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是想借流萤的名婉转表达自己的看法。谁知，不提流萤则已，一提流萤，她立即火冒三丈：“那你们去找流萤，不要找我。”流萤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使她忌恨不已。这样，两个副总编辑之间，就有了嫌隙。绝大多数人的同情都在流萤这边，她意识到此，心中就更不悦。在动员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我共写了5张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是《向×××同志进一言》。我认为×××与流萤的关系已影响到工作，举出一二事实，说明其责任主要在×××方面，×××本人应有所改进。第二张大字报题目是《请公开宣判》，这完全是一张替别人鸣不平的大字报。整风期间，农民报的王维新发牢骚说：“老薛（指薛剑英）和我个别谈话时，说我反党反领导，我到底把谁反了？”陈雪鸥在整风前也曾一次流着眼泪私下和我说：“领导上曾让我交待反党反人民的问题，我哪有这些问题，我又怎么能交待得出？”整风中我学习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我认为王维新、陈雪鸥都是好同志，他们怎么会“反党、反领导、反人民”呢？一定是农民报领导上“左”了，没把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精神吃透，王维新、陈雪鸥也可能因说话不注意，得罪了个别领导，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在这张大字报上我摘要引用了他们的原话，然后质问：“他们到底反了谁，请农民报的领导公开宣判！”另外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和潘玉军合写，一张是王维新所写，我签了名，这两张大字报都是指名针对农民报个别党员工作或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写的。第五张大字报写了些什么内容，我已完全忘记，肯定无甚要紧。在鸣放的讨论会上，我发过一些言，至今仍认为很一般。但×××听取大家的意见很不冷静，强辞夺理。我当时认为她很不虚心，心里不满。此时已到了6月下旬，×××作为××的妻子，对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已心中有数，而且清楚新闻单位是重点，所以，她没有必要表示虚心。可我一直浑

然不觉，懵懵懂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右派分子。

此时期的景超，在编辑部也备受尊重。在我去北京前，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文教工作会议，由4月13日到22日，邀集党内外人士450余人热烈讨论谈心，传达毛泽东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请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会议。报社根据会议要求，除了派文化部副主任杨康参加，也让非党的景超去报道。

景超在会上听了毛泽东两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拿回了讲话原稿，在会上听了大家的讨论，很受教育，很受鼓舞。会议结束，他写了3000多字的会议消息，其中的小标题是：

- 1、放得羞羞答答，鸣得吞吞吐吐；
- 2、要在鸣和放中来比好坏，求真理；
- 3、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以理服人；
- 4、党外人士为何不能畅所欲言？
- 5、要克服党内外的宗派主义；
- 6、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钥匙，去开人民内部矛盾的锁。

这篇会议报道，刊登在4月24日一版头条，下面并配发社论：《大胆地“放”，大胆地“鸣”》，社论由杨康写就。

这次会议对推动全省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意义重大。编辑部有些人认为，会议消息写得生动活泼，真正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去北京后，报社领导上急于改变报纸的面貌跟上形势，特意找了些思想比较活跃写作能力强的编辑记者谈话，动员他们写杂文，景超就是动员的对象。经一再动员，景超写出了第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此文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以尖锐犀利的文笔，对“经常靠行政手段”制服人的种种现象，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发人深省。此文由文化部发到了总编室，值班副总编辑樊大畏读后大喜过望，三版编辑将文章加花边发头条，樊大畏仍嫌不够醒目，嫌标题用铅字排印不突出，让三版编辑找到景超用钢笔另写了标题制成锌版于第二天（5月26日）见报。此文见报后，首先在编辑部引起大家的关注，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认为杂文针砭时弊，说到了点子上，是一

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总编室按甲等稿发了稿费。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促使他连续又写了两篇杂文：《为“三脱”干部叫屈》、《关于“抵触情绪”》（此篇未见报）。

此后，编辑部召集党外人士座谈，由副总编辑××主持，××满脸堆笑，一次又一次地口称“景超”，动员景超发言。此时，毛泽东关于“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已在半个多月前向党内少数人通知。6月8日，毛泽东又再次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中开宗明义地指示：“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同时表示要组织人们继续“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满脸堆笑动员景超发言，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的意图。但，景超不知道。在省文教代表会议上，他对毛泽东的两次重要讲话深信不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风向已经变了。所以，经××一再动员，他也畅快地说了说。其实，他的《为“三脱”干部叫屈》的杂文，于6月5日在报纸上发表时，就已内定为毒草，他浑然不觉。

7月中旬，我仍到武山县文家寺采访。这是我两年来常去的点。采访中，我心情愉快，发辫上系着从北京带来的漂亮发带，有个年轻技术员开玩笑说我：“洋气！”我不以为意，还高兴地辩解几句。下旬，接到领导要我回报社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来信，我立即搭火车回兰州，一路上也没有大祸临头的任何预感。

下了火车，回到家里已是深夜。景超已上床准备睡觉。一路坐火车我已很累了，也很快上了床。等我睡到身边，他才镇静地告诉我：“报社搞出了个右派集团，叫黑社，黑社头子就是我。”这一晴天霹雳，把我吓懵了。我们彻夜未眠。

他详细地告诉我这些天开斗争会的情况。报社领导知道他性格刚强，能言善辩，绝不会轻易地束手就擒，一开始就召开全报社200多人的大会斗争他，而且一鼓作气，连续斗争，以后每天都是100多人的斗争大会要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被认定的罪行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写了的三篇杂文都成了大毒草；二是他在报社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三是组织右派小集团“黑社”，身为“黑社”首领。

景超写杂文完全是由于领导上的动员。毛泽东大骂《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十一次扩大会议之后“无声音”，是“死人办报”。他的

批评也是针对所有的省报的，并提倡写杂文，改进报纸文风。报社领导们紧紧跟上，为急于改变报纸面貌，改进报纸文风，才动员景超写杂文的。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杂文难写，写不了，景超知难而上，写出了当时具有轰动效应的杂文，放三版头条，发甲等稿费，而后才有了第二篇、第三篇。此时，三篇杂文却都成了大毒草，谁能想到？谁能想得通？这里单对未曾见报的《关于“抵触情绪”》一文先略作介绍。此文有一段写道：“前二年，某单位的党员负责同志，曾在大会上公开称：你们再不要说党员也有某种缺点，党员拔下一根汗毛，都比你们的腰粗！试想，如果对这种狂妄自大、自吹自擂的宗派主义者，会不引起抵触情绪，倒是难以理解了。”文章提到的事实，正是发生在甘肃日报社内，说此话的人在60年代已擢升为报社副总编辑。报社初创时期，景超曾同他大吵过一次。当时实行供给制，为照顾记者采访，给记者每人发了一支金星钢笔，不知何故，未给景超发。当时，他主管此事，景超找去问他，就争吵起来，闹了个不愉快。作为领导的他，此后就到处散布景超的坏话，影响到以后的职称评定及工资等问题。这位领导人，陕西人，文化素质较低，平日里说话总爱带上个“他妈的×！”亲近他同他气味相投的人对此不以为意，有时还会引起哄笑。编辑部的人对他就另有看法。且说景超在杂文里未指名揭出的事实，正是他一次在礼堂讲话时当众说过的话。此类事实，也正是毛泽东动员整风，要求大家揭发的内容。可是，这种证诸事实的杂文，因为景超成了右派，也就成了大毒草，其揭发出的事实便不再成其为事实了。

现把《略论“行政手段”》全文录之如下。

中国古语有云：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而经常靠“行政手段”以服人者，是不会不带点“霸”味的。

所谓“手段”者，欲达目的之方法也；而能够凭借行政手段以服人的，只能是一些行政领导人物。这里无意一概否定行政手段；所欲反对者，不过只是用以“服人”的行政手段而已。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爱用行政手段以服人的人，究竟基于什么原因，都是些何等类人？但推之于理，证之于耳闻目见之事实，这种带着“霸”味的人，多半是傲于“资”，而又疏于“德”、“才”的！

说这些人傲于“资”，是因为这些人多半是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习理论，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以党自居，觉得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他们自己也便

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了；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服从是别人的义务，让别人服从是自己的权利，具体工作反正有被领导的人去作，自己只“掌握原则”、“发号施令”就对了！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这些人的身份！

说这些人疏于“德”，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些，这主要表现在对群众的看法，和对待群众的意见的态度上。他们唯我独尊，当然不会承认群众有长于他们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承认群众能见到自己所不能见到的地方，所谓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在他们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遇到不同的意见，他们并不考虑对工作如何，对革命事业如何；考虑的只不过是看别人的意见是顺着自己还是逆着自己，是有益于自己的尊严还是有损于自己的尊严罢了；他们提倡“愚忠愚孝”思想，喜欢“愚忠愚孝”的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于是，品质恶劣的人乘机钻营，形成“君子封口，小人得势”的局面，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再找不到真正的是、非！他们总是以“片面性”责人，批评别人只看缺点、不看成绩，而他们也总是以片面性护己，因为他们自己永远是只看成绩、不看缺点的！他们不愿意理解发现并消除缺点，正是自己的责任，而唯恐别人湮没了他们的丰功伟绩。说这种人疏于“德”，亦不为过矣！

说这些人疏于“才”，也并非“恶语中伤”。所谓“才”者，不外乎指以马列主义知识处理工作的能力，即指业务能力也无不可。这些人既然以为有了“资格”，就可以换得在今天必须用劳动才能换得的一切，因而优哉游哉，蹉跎岁月，无所学而无所知！在他们的口袋里，除了几个老教条和几顶大帽子，别的本钱就不多了，以至遇真理而不辨，遇善言而不听。对于自己不喜欢的意见，欲说之而无词，只好继之以“压”，于是行政手段便出来了，这便是一大堆帽子，如“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不按党的意图办事”等等。只此三言两语，便噎得提意见的人瞠目结舌，欲语无言！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爱用行政手段的人，多半是在自己的“德”、“才”不足以服人时，才搬出行政手段来的。对党的十六字方针，这些人会特别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个方针迫使他们和同志采取平等的态度，迫使他们丢掉老教条和大帽子，认真去学点东西，动动脑筋，改变“光靠党的威信吃饭”的没出息思想，丢掉“我即是党”的臭架子，踏踏实实地去做些工作。所以，这不仅对“老资格”有好处，即对于那些并没有什么老资格、而也有些“霸”味的新提拔起

来的小领导者，也大有好处。因为老的苦学，新的也就不便于光指手画脚了！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在此形势下，许多社会弊端得以暴露，靠老资格发号施令，用行政手段以服人者，大有人在。朱正对此有一段鞭辟入里的评论，他说：“他们，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各种秘密工作中获得足够的革命资历的，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当做对他们过去功绩的酬劳，却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专业知识的训练。”“一个领导人应该懂得他所领导的专业，这应该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些被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党员，有不少并不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38页。）

《略论“行政手段”》一文，指出这些“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习理论，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这些人的身份！”景超是满腔热情地从帮助党整风，期望党改进工作作风，让“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及“新提拔起来的小领导者”都刻苦学习，在领导的岗位上胜任工作，以适应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但是，批判他的文章，却说他这是要求“靠党吃饭的下台”，“靠老资格吃饭的滚开”！断章取义如此，歪曲事实如此！一个被打趴在地的人根本无法作任何辩解。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官本位”、“论资排辈”大加挞伐，砸碎铁饭碗已在全国付诸实施。这一切的举措都说明靠老资格吃饭当官，已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现再把《为“三脱”干部叫屈！》全文录之于下。

所谓“三脱”，就是脱离组织、脱离领导、脱离群众。

没有一个同志（注意这里说的是同志），是不想靠拢组织、接近领

导的。但在不少单位，确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视为“三脱”之类人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这些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些人呢？平心而论，他们只不过嘴上不大讨人喜欢罢了。如果说他们“仗义执言”，未免夸之过分；但是，如果说他们是由于看不惯工作中或某些领导人身上的缺点，而偏爱“发发牢骚”、“提提意见”，却倒真是事实了。当然，这些人不可能不和一般人一样，自己身上也多多少少总有着某些缺点，如“偏激”、“片面”、“不讲究方式方法”、“小资产阶级情绪”等等，因而往往“言不中听”、“出语刺耳”，这就招了某些领导人之忌。在某些单位里，要求盲目服从领导的风气，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这些领导人只承认一个“道德标准”，那就是“盲目服从”。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而排斥的人！

或曰：“君何危言耸听耶？！”当然，这些话在某些人听来，是会感到刺耳的。但，刺耳由它刺耳，当说我自说之：在这次大鸣大放的民主浪潮里，许多党外同志对组织上、领导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许多意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问题。人事部门一般既代表组织，又代表领导；人事干部本来应该是革命同志倾心倒肚的知己，帮助、教育、团结党外同志的长上，但许多意见都说人事部门是个“特殊组织”、“独立王国”，令人心存戒意，敬而远之！何以党的威信齐天，而某些人事部门的威信却“平地”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以一个模子要求人的人，是不可能不偏听偏信的，于是经过他们的手，终于画出了“亲生”与“后养”的界线。尽管“亲生”的未必个个争气，但他们是贯彻“领导意图”的依靠，是“领导威信”的维护者，思想“进步”，所以处处顺利，事事如意。“后养”的即便勤勤恳恳地作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的意见，但终因隔着一层肚皮，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之类的责骂！于是，犹如风助火势，“亲生”排斥“后养”的现象，在下边便愈演愈烈；未必作了工作的人，可以指手画脚地骂人；而真正作了工作的人，倒忍气吞声地挨骂，哪里还能分出是非，辨明黑白？组织上这种不是“相引”实乃“相斥”的态度，让人怎么去“靠拢”呢？！

一旦被扣上了“脱离组织、脱离领导”的帽子，是急切翻不了身的！对组织上、领导上犹靠之不拢，遑论群众？领导上影响群众，让群众

鄙视他、冷淡他，他们再也找不到知心人，听不到知心话，或由自卑而消沉，或由气恼而孤傲，被禁锢在精神囚牢里，岂能不脱离群众？！

应该说，这些同志绝不属于所谓“消极因素”，其所以外表消极者，盖因含冤受屈故也。写到这里，我要“反话”“正说”了：这些同志并非真的脱离了组织和领导，而是组织和领导上脱离了他们！所以我才敢于为“三脱”干部叫屈，并吁请以“盲目服从”的道德标准要求人的领导者，抛弃这个标准，而以马列主义的是非观点对待所有的同志！

《为“三脱”干部叫屈》一文，指出有些领导人喜欢“盲目服从”。“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而排斥的人！”

后面还提到人事部门工作中的问题，指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

有些人“即便勤勤恳恳地作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的意见”，而“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之类的责骂！”

景超对“盲目服从”、“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弊端的挞伐，文笔犀利，点到了要害处。就是在 40 多年后的今天，以上弊端仍以各种新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时对此文的批判，主要指出：“其主旨是为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喽口罗争取合法地位，为他们争取群众，为他们打气撑腰，为他们控诉，为他们向人民倒算！”22 年后，景超和众多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平反，此说当不攻自破。

敬爱的读者看了以上两篇杂文的全部内容，一定会认为两篇杂文是针砭时弊的好文章，文笔犀利，针对性强。就是放在当今社会，其针砭的意义仍不乏其应对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好文章，在反右斗争的形势下，竟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景超遭此诬陷，有口难辩，真是冤哉冤哉！景超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斗争会上

，当然被认定为喷着毒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故作亲切，堆着满脸笑一再动员景超发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再说所谓的“黑社”，完全是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一手制造出来的。总编室的杜绍宇，同景超 1951 年在庆阳地区报道土改时结识的挚友王思曾是小老乡，都是河南灵宝人。王思曾原来也是西北大学的学生，来甘肃后在青年团甘肃省委做秘书工作，此人对团省委书记×××的工作有看法，提意见很刺耳，说“我对×××的工作作风深恶痛绝”！×××对他自然认为可恶之极，在 1955 年肃反时搜罗“罪证”，将他定为坏分子，并把他周围的一些人定了个落后集团。王思曾于 1952 年主持创办《甘肃青年报》，带了一帮人在甘肃农民报学习过，

和我及农民报的有些人也非常熟悉。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好同志，不是坏分子。到 1957 年鸣放开始后，王思曾另一个小老乡荆赞哲，和杜绍宇熟悉，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更是愤愤不平，他找到杜绍宇表示，即使他本人丢掉工作也在所不惜，他一定要为王思曾鸣冤叫屈，力争使王思曾定为坏分子之事得到解决。景超原来和杜绍宇来往不多，但杜绍宇知道景超和王思曾是挚友，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极表同情。在此时期，他们之间就有了些来往，杜绍宇还把荆赞哲带到我们家，商量如何为王思曾翻案，荆赞哲答应回去后先写材料。杜绍宇为王思曾翻案之事来我家几次之后，适值鸣放期间，也和景超一起对报社的有些事作过议论。反右斗争开始后，杜绍宇因为得罪了×××，先在总编室受到批斗，在交代问题中说到同景超有来往，×××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大鱼是景超，而非杜绍宇，经过同总编室副主任××诱供逼供，硬是让杜绍宇供出了个“黑社”，网罗了编辑部 5 名右派分子。为坏分子王思曾翻案，成为杜绍宇、景超和我 3 人的共同罪行。

我奉召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早上，仍换上了雅致素净的裙装，穿上了从北京买来的浅黄色半高跟皮鞋，踏上宿舍不远处的大台阶，向南拐个弯，走向编辑部大楼。在一楼的过道里，我看到了向“黑社头子王景超猛烈开火”的好几张大字报，也看到一两张大字报要我揭发黑社头子王景超，指出我也有反党反领导的言行，必须低头认罪，还质问我鸣放期间为什么同黑社头子王景超表现那么“一致”？此时的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是想应如何面对现实，对付这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灾难。我仔细地逐一看完了批判景超和我的大字报。左一个“反动透顶”、右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批判用语，令我目瞪口呆，我绝难接受如此的现实，心底涌出阵阵悲凉痛楚。

当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墙上还贴着红旗竞赛的报表，二版的格内扎着好几个用大头针做的小红旗。这是对我的工作成绩的肯定。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到四楼会议室开批判斗争会去了，斗争对象就是景超。

景超和我都无法改变这个冷酷的现实。

景超每天经受一二百人的批判斗争已经有些日子了，奇怪的谬论，无与伦比的谎言，被当做批判他的重型炮弹不断地猛轰。我坐在报社定做的考究的皮靠椅上，沮丧，难过，六神无主，耳边时不时地传来四楼会议室里发出的众多的喝骂声，叫喊声，虽说听不真切，集中猛烈的火力都是对准他一个人的。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准了无辜的他猛轰不止，他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以以为自己辩护说清问题。天哪，这些天来他的精神一直在经受着怎样粗暴的蹂躏？

他曾顽强地据理力争，想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但这样的斗争会岂能允许他为自己说话？全国在册的 55 万多右派分子又有哪个未曾试图为自己辩护过？但他们连张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啊！终于，一次次的狠批猛斗，使他脸色苍白无以答对，心神困顿到了极点，一二百人的吼叫詈骂，逼迫他不得不按照“组织上”和“群众”为他限定的思路编造低头认罪的谎话，说自己思想反动，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径。不是因为软弱，更不是由于虚伪，他才违心地编造谎话，臭骂自己。他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万分委屈，根本无法接受。而当时无论他或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运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我们仍崇拜中国共产党，对于反右斗争在内心深处虽有不解之处，特别是对把自己打成右派根本想不通。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我们，对于通过新闻渠道传播的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都深信不疑，绝没有想到其中会有什么虚假。诸如《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原国民党少将，在鸣放中说，“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云云，我们绝对地相信都是真的。我们想，北京出现了“章罗联盟”，像葛佩琦这样“反动透顶”的人物都跳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不反击能行吗？哪里知晓，葛佩琦曾致函《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上述不实之词；哪里知晓，葛佩琦是 1938 年的老党员，解放战争期间，他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以国民党“少将督察”、“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出入虎穴，不断取得国民党军队的绝密情报，通过电波发往延安，功绩显著。我们更无法预料，葛佩琦在反右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经历了 18 年的铁窗生涯，滑稽的是他在 70 年代初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被特赦。到了 80 年代经胡耀邦亲自批示，几经波折，到 1983 年沉冤也得以大白。（见《胡